

时代与思想

—— 儒学与哲学诸问题

黄玉顺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时代与思想

—— 儒学与哲学诸问题

黄玉顺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与思想：儒学与哲学诸问题 / 黄玉顺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9

ISBN 978-7-209-10586-6

I. ①时… II. ①黄… III. ①儒学—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2064号

时代与思想

——儒学与哲学诸问题

SHIDAI YU SIXIANG RUXUE YU ZHEXUE ZHUWENTI

黄玉顺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24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

印 数 1-1000

ISBN 978-7-209-10586-6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编 儒学问题

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新儒家	3
论“大学精神”与“大学之道”	6
左氏易传注疏瑕疵	16
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	26
儒学与现代社会	
——“儒学与现代社会”丛书出版说明	38
“儒藏”三问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30 华诞感言	41
易学对于中国哲学当代重建的意义	
——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深度关涉	52
当代儒学：路在何方？	
——《原道》20 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65
大陆新儒家当如何“一以贯之”	70
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78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	
——驳“反孔非儒”说	90
儒学与作为科学理论基础的知识论的重建	107
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113

第二编 哲学问题

价值主体的生活渊源

- 回复孙美堂教授的一封信 125

马克思与西方现代哲学 133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149

谈谈“思想”

- “四川思想家研究”丛书序 214

追溯哲学的源头活水

-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讨论 217

主体性的重建与心灵问题

- 论当代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重建 233

中学西进：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历史使命 245

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进”

- 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历史使命 249

“时间”观念何以可能

- 从“无间性”到“有间性” 262

前主体性对话：对话与人的解放问题

- 评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 279

比较：作为存在

- 关于“中西比较”的反思 294

第三编 杂 论

何为中华心 311

说 诗 330

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天时、地利、人和 331

当今儒家的“创教”与“干政”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

——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点评发言 334

“本体”与“存在”

——与成中英先生商榷 339

中国学术与中国之自由精神

——《内道外儒——鞠曦哲学思想述要》序 341

关于建立曲阜文化特区的几点意见 347

自由与“从心所欲不逾矩” 349

“家国天下”散论

——历史法学学会的发言 351

第四编 附 录

情系母校

——专访成都大学校友黄玉顺教授 成都大学校友会 363

新文化运动并非“反孔非儒”，反倒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 徐 萧 371

建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常 强 375

第一编

儒学问题

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新儒家^①

目前的儒学复兴运动，被指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我曾撰文谈到，“文化保守主义”这个含混的符号，是对当下生活本源的一种遮蔽。我的意思是：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标签，并不能揭示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本质渊源，反而可能将这场运动导向原教旨主义。

现代新儒家也一向被归入“文化保守主义”。最近，方克立先生把蒋庆、陈明归入现代新儒家的“第四代”，也就是把他们归入“文化保守主义”，因为方先生一向认为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这不仅是对现代新儒家的一种定位，而且也意味着对当前的整个儒学复兴运动的定位。我这里并不想谈蒋、陈与现代新儒家的关系，虽然在我看来，蒋、陈并非什么“现代新儒家”，纵然他们在观念上确有某种关联。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定位依然存在着，甚至加深着对当下生活本源的遮蔽，而这种遮蔽隐藏着某种危险。

当然，“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称谓的流行，也自有它的道理：首先，不论是已经三代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确实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文化纠缠”；其次，这种纠缠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这种表达恰恰意味着生活本源的遮蔽；最后，正是这种遮蔽，蕴含着走向原教旨主义的某种必然性。

应该说，现代新儒家本是应运而生的。所谓“应运而生”是说：“顺应”着某种“时运”。这种“时运”正是儒家的“天命”观念，但并不是宿命论意

^① 原载《读书时报》2005年11月30日，第1版。

义上的命运观念，而是一种原初意义的“革命”的观念，也就是《易传》所说的“时义”观念：“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天命”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的演流。这种演流被我们领悟为“命”、领悟为“口令”，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作为大道的道说，在无声的言说中给予我们的一种“语境”。我们唯有倾听这种“语境”，才能实行真正意义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过是孔子所确立的“礼有损益”原则的实行，这里并没有任何原教旨主义观念可以插足的余地。

回首当年的现代新儒家，在其崛起之际，他们所“顺应”的“时运”，小而言之，那是当时的民族生存危机，尤其是“抗战”中的民族生存危机。但是，大而言之，却有着更为宏阔的语境，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性诉求。不论是当年的现代新儒家，还是今日的儒学复兴运动，究其本源，都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所谓“现代性”，蕴含着当代性，甚至所谓“后现代状况”也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内涵的延展。）民族性是现代性的基本涵项，正如现代性是民族性的基本涵项。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互涵，是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民族国家”（nation）时代的一个要领。现代性的诉求，源于我们当下在世的生活情境；民族性的表达，源于我们对于这种本源情境的生活领悟。所以，没有民族性表达的那种现代性诉求，是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殖民意识、文化上的“受虐待狂”，那是危险的；然而没有现代性诉求的那种民族性表达，则是原教旨主义的“夜郎意识”、文化上的沙文主义，那同样是危险的。

但是，现代新儒家却并没有意识到生活本身的这种原始的张力。当然，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有着深切认同的，但对生活本身的现代演流及其诉求缺乏深切的思考。这并不是说，现代新儒家对现代性诉求无所言说，恰恰相反，比如，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第二代，绝大多数都对“科学与民主”，亦即包括政治层面上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念抱有一种接纳的胸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新儒家比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者更清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现代新儒家通常是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郑家栋的看法。熊十力、牟宗三这个谱系的哲学思考，甚至达到了一流的水平。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恰恰是对生活本身的遮蔽。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在20世纪以来的当代思想中，恰恰是必须被“解

构”的东西，因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那是“遗忘了存在本身”，而用我的话来说，那是“遗忘了生活本身”。他们思考形而上的存在者、形而下的存在者，但是恰恰遗忘了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所以，我还同意郑家栋的另一个看法：现代新儒家已归于消解。例如林安梧，我并不认为他属于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只有形而上学的哲学，而没有真正彻底的思想。

真正彻底的思想，就是首先回归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首先回归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生活方式本身。我们正是在这种生活情境中获得生活情感、生活领悟的；我们作为当代人、中国人，也是在这样的生活感悟中生成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事情。这就是说，这决不是什么“文化保守”的问题，而是这样的课题：回归生活，重建儒学。这才是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所应取的正确方向。

论“大学精神”与“大学之道”^①

西方传入的现代大学模式作为一种学制，丧失了某种“大学精神”。这种大学精神就是：居仁由义。这种大学精神乃蕴含在“大学之道”之中。这种大学之道就是：立德爱人。这种大学之道最初表述在作为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文本里。诚然，当我们用一个中国古有的词语“大学”去翻译西方的词语“university”并获得普遍认可的时候，这已经表明了两者之间尽管没有等同性，却毕竟存在着某种对应性。但这种对应性其实只是外在的，仅仅意味着，不论古今，所谓“大学”所指的都是教育体制当中在学龄上的最高阶段而已。换句话说，这种对应性并没有涉及大学的某种内在精神——大学精神。

一、大学之道的纲领

儒家经典《礼记·大学》精炼地表述了“大学之道”的纲目：

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八条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

^① 原载《寻根》2010年第4期，见韩星主编：《中和学刊》（第2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①

所谓“三纲领”并不是并列的三条。其中“止于至善”乃是统领性质的：不论“明德”还是“亲民”都要“止于至善”，如王阳明所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大学问》^②）因此，“大学之道”其实就是两个方面：明德、亲民。这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③，亦即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或“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④）。修己就是修身以明德，安人就是爱人而亲民。

（一）明德：立德

原文中的“明明德”，后面的“明德”是名词性的偏正词组，所指的就是“德”，“明德”是说人的德性原本就是明朗的，亦即《中庸》所说的“自诚明（由诚而明），谓之性”；前面的“明”是动词，是说原本明朗、因遮蔽而晦暗了的德性，乃通过教化而重新明朗起来，亦即《中庸》所说的“自明诚（由明而诚），谓之教”。所以，“明明德”可以简称为“明德”（动词+名词）。

说到“德性”或“人性”，有两种不同的、却同样偏颇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孔孟以后的儒家形而上学的先验论，将人性设定为某种先天本性、绝对本体。另一种观点则是当代的某种经验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彻底否认任何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观念。然而儒家传统中还有一种更为恰当“折中”的观点，一方面承认人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则认为人性并非什么先验的东西，而是在生活情境中“日生日成”的。例如《古文尚书·太甲上》说：“习与性成。”^⑤王船山解释说：“‘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今言‘习与性成’，可以得所折中矣。”“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举凡口得之成味、目得之成色、耳得之成声、心得之成理者皆是也。是人之自幼迄老，无一日而非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② 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 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⑤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此以生者也，而可不谓之性哉！”（《尚书引义·太甲二》^①）

这种观点符合孔孟的思想。例如孟子就深刻阐述过这个问题：一方面，德性作为“大体”（性体）是存在的；另一方面，这种“大体”是在生活情境中“立”起来的。故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②）那么，这个大者、大体是怎么立起来的呢？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这段著名论述，所讲的正是德性是怎样立起来的问题：在某种生活情境中，作为仁爱情感的惻隐之心显现出来，但这并非“四德”（先验的德性），而是“四端”，即德性之确立的发端，犹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需要“扩而充之”以后，才能成为德性本体。因此，大学之道的“明德”，更确切地说，应该叫作“立德”^③。

在生活情境中促发仁爱情感，进而将其确立为德性本体，此事有时候是自然而然的“（由）诚（而）明”，有时候是人为设计的“（由）明（而）诚”。后者是“教”的问题，也就是《中庸》所说的“修道之谓教”、《大学》所说的修身立德的问题。

所以，大学之道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修身立德。可惜的是，现代大学的第一宗旨却不是立德，而是求知（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这种状况，孟子谓之“无本”：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

① 王夫之：《尚书引义》，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③ 这里所说的“立德”并非《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论“三不朽”中的“立德”。

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

这种“无本”（没有德性本体），乃因“无源”（没有生活情境之中的仁爱情感的源泉）。

（二）亲民：爱人

大学之道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要爱人亲民。如果说修身立德是针对自身而言的话，那么爱人亲民则是针对他人而言的。所谓“亲民”意思就是孔子所说的“爱人”（《论语·颜渊》）乃至孟子所说的“亲亲→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如王阳明所说：

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大学问》）

对于“亲民”的理解，传统学术中存在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区别。朱熹认为“亲民”的意思应为“新民”，他说：“‘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大学集注》^①）王阳明则以为不然，认为“亲”就是亲爱之义，“亲民”也就是爱人：“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大学问》）其实，这两种观点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如果推己及人的起点是“己”，那么，在确立、明朗自己的德性时，爱己、爱人必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其结果自然是自己既去旧而立新，他人也去旧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而立新。自新缘乎自爱，新民缘乎爱民。

可惜的是，现代大学用以教育学生的，往往不是爱人亲民，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并且煞似有理地美其名曰“生存竞争”，殊不知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本质上只是一种动物哲学、禽兽伦理学，是将人与动物混为一谈，而忘记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离娄下》）。

综上所述，大学之道就是两个方面：立德→爱人。这就是说，在生活情境的仁爱显现中确立自己的德性良心，并且推己及人乃至推人及物地亲爱人与物、革新人与物。现代大学如果不以此为自己的根本大道，那就不是真正的大学。

二、大学之道的条目

那么，究竟如何具体地立德、爱人呢？《大学》提出了八个条目，与立德、爱人相对应，分为两个方面：格物致知而诚意正心（修身立德），齐家治国而平和天下（致用亲民）。

（一）修身立德

八条目原文中的“修身”，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步骤，而是对于前面“格致诚正”的概括、收摄。换句话说，修身立德是通过具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实现的。



三纲八目对应关系

1. 修身：格物致知

所谓“格物”和“致知”其实并不是两件事情，而是同一回事的两个方面：在实践中获得真知。故朱熹说：“盖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别有致处也。”

(《朱子语类》^①卷十八)

但这里所说的“在实践中获得真知”并非现今通常所说的“实践出真知”。这种“实践”首先并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而是伦理学意义上的，甚至是更为本源的生活情境意义上的仁爱情感的存在显现。我们毕竟总是在这样的生活实践——生活情境中存在。而这种“真知”也不止是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首先是道德伦理意义上的，甚至是更为一般的形上的德性意义上的问题。正如朱熹所说：一方面是由博知而尽心知性，“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一方面是由众理而归于一理（天理），“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或如王阳明所说：“‘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大学问》）良知作为这种“真知”不是形下的东西，既不是形下的知识，也不是形下的道德规范，而是两者的形上根据；良知甚至首先不是形上的终极根据，而是更为先行的对于本真仁爱情感显现的一种领悟。如果说本真的仁爱情感是“良能”，对于这种良能的直觉领悟是“良知”（《孟子·尽心上》），那么，在这种领悟中通过扩充之思而确立起来的德性本体就是“良心”（《孟子·告子上》）。现代大学教育所欠缺的，恰恰是这种意义的格物致知、实践真知：通过唤醒对于良能的良知，而确立起良心。

当然，“格物致知”可以包含科学、技术、知识、博物的意味，唯其如此，后来人们称自然科学技术为“格致之学”。例如，早在明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翻译德国《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明代胡文焕编“格致丛书”178种，实为考证古今名物知识的博物之书；清代康熙年间陈元龙编的博物类书，叫作《格致镜原》；傅兰雅于1876年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期刊 *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中文名叫《格致汇编》；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特辟有“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一章。可见有识之士皆知：中国极其需要这样的形下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大学倒是做得不错。但是，无论如何，《大学》的“格物致知”，首先根本上乃是修身以立德，而非寻求科学技术知识。现代

①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